

文章编号] 1002 - 2031(2008)10 - 0059 - 06

北京市韩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整合

——以望京“韩国村”为例

何 波

摘 要] 在北京的韩国人数量逐年递增,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聚落群体,其中以望京的“韩国村”最具代表性。基于实地调研所得第一手资料的实证性研究,探讨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现状特征、对原社区的影响以及衍生出的社会、文化问题,并就社区整合提出解决对策,以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的社区和谐管理新机制的探索。

关键词] 流动人口聚居区;韩国村;社区整合;望京

中图分类号] C912.81;D631.42

文献标识码] A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来华人口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据“驻华韩人会”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三至四十万韩国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其中约有十万人在北京。“韩国村”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城概念,而以现实社区的形态存在,影响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及“民工潮”背景下,在城乡边缘带形成的以外来暂住人口为居民主体的自发型集中居住区^[1]。“韩国村”则是快速国际化大都市在全球化背景下伴生的外籍人口聚居现象,呈现出与前者不同的形态、格局和变化趋势,对此类新型聚居区的关注和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属“稀薄地带”。笔者试图通过实证性研究,推进城市社会地理学视角向这一时代产物的延伸。

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主要形成了三大聚集区:望京、五道口和顺义。不同于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北京的“韩国村”并不是空间上相对隔离、韩国侨民占据主体的集聚群落,而是“渗入”当地社区、与中国居民混居在若干小区内

的较为密集的几片区域,因而称之为“韩国人聚居区”更为合适。三个聚居区中,望京和五道口最早成型于1990年代中期,顺义则是在2002年后随着北京远郊韩国工业园落成而兴起的最年轻的韩国聚居区。三个聚居区依傍不同的区位优势而成,各有特点,其中望京由于韩国人聚居规模最大、身份最混杂、名声最响而最具有研究代表性。本文就以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为例,基于实地调研、访谈和参与社区事务等途径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探讨中国国际性大都市中新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一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概况及发展历程

望京位于北京城区东北部的朝阳区内,往东可接酒仙桥电子城,往西可接亚运村和奥运村,往南可接燕莎商圈和CBD,往北可达首都机场。望京地区以湖光北街和洪泰西街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为望京新兴产业区,由新兴产业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南区为1990年代规划的望京新城所在地,现辖20个社区,由望京街道办事处管辖。南区作为纯居住社

作者简介] 何 波(1981—),女,汉族,浙江丽水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研究室规划师。

收稿日期] 2008 - 03 - 19

修回日期] 2008 - 04 - 18

区,是韩国人最集中的区域,也是笔者研究的主要范围。

望京新城是北京最早规划的商品楼住宅开发区,1994年规划面积860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于老北京城区面积的一半。当时韩国人还较少,主要散居于望京南部花家地一带的老社区,看中的是望京位于首都机场和旧城区之间,环境相对宽松,离韩国驻华使馆、最早的一批韩国企业以及周边的高等院校距离较近。1997年望京新城首家楼盘望京西园四区竣工,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200多户韩国侨民,他们大多由花家地搬迁而至,相对于花家地的老房子,新楼盘的高品质设计和良好的小区环境迎合了韩国侨民的需求。随着四环通车,望京环境整体提升,望京新城渐具规模,韩国人越来越多,口碑相传,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2000年后,望京迎来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区内的韩国人开始急速增加,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韩国生活圈。截至2005年,望京新城早期开盘的几个小区,包括望京西园四区、大西洋新城和望京西园三区的韩国住户数量可以达到小区总人口的20%-30%。当地居民口中所谓的“韩国村”主要就是指这3个小区。

望京的韩国人聚居区是韩国侨民基于“民族认同”自我选择的结果。最初来华的韩国侨民在选择居留地时主要考虑区位因素,接近已存在的利于自己生活工作的机构。随着来京人数的扩大,后来者通过政府驻华机构、民间团体、亲朋好友等渠道得到择居方面的指引,自发地与先至的同胞“群居”在一些小区内,在一种民族情感的链式传动下结成了具有独特社会网络的“亚社区”。在这里,种族成员间通过分享民族网络,最大化内群体的社会交往,保留本民族的生活规范和价值体系,并为公共服务的建立和共享提供规模门槛。

目前韩国人入住的小区都处于中韩混居状态,还没有出现韩国人高度隔离的社区。在布莱克瑞奇涅尔和斯蒂芬对加拿大多个种族群体居住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隔离程度与社会距离有关,例如,法国移民相对于亚裔、其他西欧民族以及犹太移民具有更低的集聚度和隔离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共性以及语言的熟练程度,并使得彼此的社会距离较短^[2]。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渊源关系,因此两国人民存在互通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是形成北京韩国人聚居区低隔离度的主要原因。

二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社会空间结构

1 空间分布结构

据望京街道办事处统计,截至2005年3月,望京地区共居住韩国人2651户,5890人。望京街道下辖的20个社区中,17个社区均有韩国人居住。其中,望京西园四区、望京西园三区、大西洋新城的韩国人最多,分别有韩国住户约2375人、1403人和1620人。

从空间维度上看,望京的韩国人分布呈现两大特点:集聚程度高,91%的韩国人居住在20个社区中的3个小区;呈现圈层分布结构,以位于望京新城核心位置的望京西园四区为中心,韩国人数量基本上随距离递减。有韩国人居住的17个社区按照集聚规模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圈层:核心圈层为望京西园四区、三区和大西洋新城3个小区,属于20世纪末的京城首批商品房项目,韩国侨民数量在千余人以上;第二圈层为紧邻上述三区的新兴高档商品房,属于2002年后房地产开发高潮时期相继建成的楼盘,租住韩国人数量在100-200人左右;第三圈层为韩国人数量最少的外围一些社区,如花家地一带,韩国居民人数不足100人,这其中大部分是1990年代前的老社区,以及少数本世纪初投入使用的新楼盘。

聚居区内韩国侨民的居住地选择显示出两种倾向:一方面,聚居性一直是群体性择居行为的主导特征,成熟的民族社区对来华韩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他们提供了适应主流文化社会的学习环境和过渡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个体性择居行为受社会经济地位和适应能力的影响,显示出空间的差异性。对于部分收入阶层较高、或者对本民族社区依赖度较小的成员,越来越多带有国际化设计特色的新兴小区满足了他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成为近年来择居的重点。聚居区内的空间分异和范围扩散标志着民族群体隔离程度的降低,是在空间上同化的“关键因素”^[3]。

2 人口结构

(1) 职业构成

望京韩国人的职业分布主要分为三类:经商,经营韩式商品、韩式餐厅、幼儿园等服务人员;留学,望京地区毗邻中医药大学、中央美院、北京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等多家有资格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专院校,吸引了大量韩国籍留学生在此

学习;公司职员,韩资企业技术人员及家属(表 1)。

表 1 2002年底望京西园三区、四区韩国住户职业分布

职业	人数(人)	占韩国总人数的比例(%)
留学生	463	15.9
商人	1313	44.9
驻华使馆外交官	1	0.0
家属及其他来京人员	1144	39.2
合计	2921	100.0

数据来源:望京西园居委会提供。当时两小区共有韩国人 1022 户,占三区、四区总户数的 10.04%。

(2) 年龄构成

以望京西园四区 413 楼作为抽样调查样本,截至 2005 年 4 月底,有韩国居民 45 户,共 111 人,其中 31 户为韩国家庭。总体年龄层次偏低,10 - 29 岁年龄段占总人数的 56%,其次为 30 - 49 岁年龄段,总人数中未成年人占到了 40%左右(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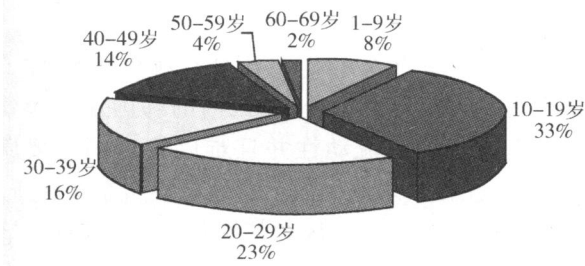


图 1 望京西园四区 413 楼韩国住户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望京派出所外籍人口管理办公室提供)

韩国人家庭观念重,长久以来在男权主义色彩的社会伦理观念影响下,家庭角色多为男性外出工作,女性操持家政。“韩国男人来中国,会带上老婆、几个孩子、父母,再雇个鲜族保姆伺候这一大家子。望京的一名韩国住户如此说。相对于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年男性,妻子、老人等为了陪伴亲人来到北京的韩国侨民,他们对全新文化环境的适应过程更长,对本民族聚居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更加强烈,也是促成望京韩国人聚居区高集聚程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3 自我完备的“韩国生态”

民族群体的规模集聚带来独特的优势。望京的韩国人身份混杂,存在大量的韩国家庭,其多样的文化、生活需求直接刺激并推动了“韩国生态”的形成,从商业到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再到社会团体,生活的每个环节几乎无一不备。

社区里随处可见中韩双语标注的广告牌,各种由韩国人社区应运而生的商业形式一应俱全。小区

里有好几家由韩国妇女合伙开办的幼儿园,每天接送韩国小学生的班车往来于使馆区的国际学校和望京之间。2002 年,中韩合资的望京新城医院在望京西园四区开张,医院聘用了很多会两国语言的大夫,而护士大部分都是朝鲜族人。这家社区医院的就诊量颇高,接待的病人里,中国人和韩国人差不多各占一半。

望京有五六个韩国基督教会,各自有定期的集会地点,是京城韩国侨民维持日常宗教仪式的主要场所。韩国官方的派驻机构,也是在华韩国人最大的团体——“驻华韩人会”的总部就设在望京新兴产业区内,其下还有“在京韩人会”,并在望京西园成立了“望京分会”。“驻华韩人会”定期举办在京韩国人的集会和交流活动,拥有自己的韩文杂志、报纸,随时报导在北京韩国人的生活情况和成功经验,必要时还会协助社区居委会调解中韩住户之间的矛盾,共同开展社区活动。

三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问题及影响

1 社区退化

韩国侨民的聚集带来了外来资金和新鲜文化,但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打破了原住民社区的结构,多民族人口混居引起的复杂反应改变着原社区的性状,引起了聚居社区的变异和退化,尤其突出反映在韩国人规模最大的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

(1) 纯居住社区向商住混杂社区蜕变

截至 2005 年 3 月底,公司地点位于望京内的注册韩国企业一共有 104 家(图 2)。除三星等少数大企业外,韩国人在望京的投资规模普遍较小,个人投资居多。个人投资的行业 95% 以上集中于服务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这些个人投资的商户往往以社区内的韩国住户为客户群,为了接近客源并节省租金,许多私人投资者直接租用社区内的住宅而非商铺营业,干扰了社区正常的生活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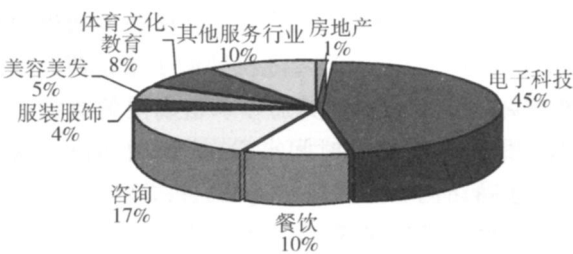


图 2 望京韩国企业行业分布情况(截至 2005 年 3 月)
(数据来源:朝阳区商务局提供)

另一方面,多民族社区内独特的经济机会以及

相对周边新兴高档楼盘廉价的租金,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商人进入投资。截至2005年5月,设立在望京西园四区的法人单位共有165家,其中12家为韩资企业。165家企业中,62%为服务业,其中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就占54家。过多的商业嵌入原来的居住用房,商业功能不再是居住功能的辅助,而成了侵犯,影响了原社区稳定的居住环境。

(2) 社会阶层复杂,新贵阶层向中低阶层演替

望京新城规划初始定位为高档住宅区,目标群体锁定“中产阶级”——中高的房价、北京户口的限制,都意味着望京新城的第一批住户是北京第一批奔小康的人。短短七八年工夫,当年的高档小区成了社会各个阶层混杂的商住混合区,最早一批居民大多将自有房出租或转手出售,搬出了望京。

访谈中韩住户都告诉笔者,目前来望京进行个人投资的韩国人收入在中下层的居多。身份阶层各异的韩国人陆续涌入扩张中的民族聚居区,改变了原来社区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形成了社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韩国人的聚居为既通韩语又通汉语的朝鲜族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于餐饮、日用品、房屋租赁中介、美容美发、家政保姆等行业。据街道办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中期,望京内的朝鲜族流动人口近1000人,他们的空间分布大致和韩国人趋同,韩国人多的社区朝鲜族人也多。在韩国侨民数量最多的几个小区里,每日闲坐在社区中心广场等待雇佣的朝鲜族保姆已经形成了靠地缘、亲缘关系联结的行业群体。在外部利益驱动下,少数社区将地下室改造出租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

(3) 韩国住户流动性大,社区居住环境不稳定

2004年以前,望京韩国住户的身份主要以“房客”为主,随着2004年上半年房地产对外籍人士解禁,一些新兴楼盘开始逐渐接纳了一批韩国业主。而在较早的“韩国村”中,韩国住户仍是推动当地租赁市场的主要力量。笔者随机抽取了望京西园四区109位韩国住户的签证类别和承租期限的数据进行统计(图3)。从居留时间来看,持短期签证的人数最多,包括访问签证和旅游签证,各占33%和27%;同时,这两类签证的流动性也较大,各自均有30%以上租期在一个月以内,60%以上在半年以内。单从承租期限来看,97%的韩国住户租期在一年以内,其中租期少于一个月的占总数的31%。

2 文化隔离和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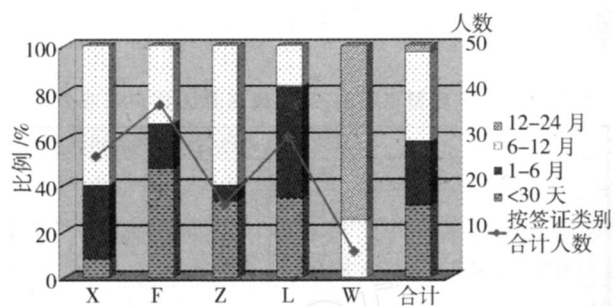


图3 望京西园四区抽样韩国住户的签证类别和承租期限统计

(数据来源:望京派出所外籍人口管理办公室提供)

注: X:学习签证,发给来中国进修、留学、实习6个月以上的人员; F:访问签证,发给应邀来中国访问、考察、讲学、经商、进行科技文化交流及其短期培训、进修、实习等活动不超过6个月的人员; Z:职业签证,发给来中国任职或就业的外国人及其随行家属; L:旅游签证,发给来中国旅游、探亲或其他私人事务入境的人员; W:外交签证,发给各国高级官员和具有外交身份的人员(外交官、领事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据居委会负责人介绍,韩国住户流动性大,除了来京事由多为短期居留外,社区内的韩国住户频繁搬迁是造成他们高流动性并且难以管理的主要原因,他们往往在望京地区内不断地更换房东和住所,却很少有搬出望京的。从对韩国住户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中韩住户居住习惯的差异、韩国租户和中国房东的矛盾、充足的房源以及房屋中介机构的推动,都是促成韩国侨民不断寻求更合意住所的原因。

韩国侨民与中国居民混居在同一社区中,居住位置的毗邻带来了生活范围的交集,也引起了文化的冲撞。夜生活太多、醉酒喧哗、摩托马达震天响、礼拜唱诗,这些都成为中国居民将韩国人视为扰民源头的理由。狗进电梯、穿着睡衣出门,这些国民“习以为常”的行为又让韩国住户不能理解。双方的矛盾曾经一度激化,但是由于缺乏基于共识的行为规范和协调约束机制,这类冲突一般由居委会或派出所出面调解,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从根本上无益于解决矛盾。生活上的冲突阻碍了文化的沟通和理解,中韩住户虽然居住在一个小区里,实际生活却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彼此很少交往。两个民族居民之间隔阂的存在不利于社区管理,也严重阻碍了社区整合工作的开展。

3 管理困境

目前,国内针对外籍人口的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公安部门 and 外事部门,在社区这一层面,基层派出所承担了对外籍住户日常登记和管理的主要职

责。在一些韩国侨民密集社区,由于韩国租户数量较大、阶层复杂、流动频繁,缺乏相应的约束管理机制,派出所的实时数据更新和跟踪管理的工作量庞大,也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完全落实。同时,对外籍人口的管理处于敏感地带,目前还属于盲点,基层派出所所在处理涉外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显得力不从心。

在社区自治组织层次,居委会对于韩国住户的统计工作从2004年才开始起步,也只能限于在街道办指示下年度定期普查工作,无法形成自觉登记、双向互通的良性机制。同时,由于城市政府长久以来在对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和经验上的防范式倾向^[4],居委会在工作中往往以政府主导型管理机构的身分介入,缺乏对外籍住户的服务意识,加之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等原因,常常遭遇韩国住户的抵制情绪,加大了普查难度,数据采集的可靠性也有待商榷。

在望京新城外围的不少新兴楼盘,针对近年来崛起的外籍顾客群,引入了人性化的涉外物业管理服务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涉外居住服务,如为住户订购外国流行杂志、开展有特色的会所服务,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碰到的问题等,吸引了不少收入阶层较高的韩国住户,提高了物业的出租率。但是,此类时尚小区往往出于保护住户隐私或者商业利润驱动等考虑,游离于行政机构的外籍人口管理体系之外,对于内部两国住户之间的矛盾调解主要以息事宁人为目的,处理方式也往往会让中国居民感觉偏袒韩方。

四 社区整合的对策研究

1 转变管理观念,加快基于共识的相关规范和协调机制的研究和制定

社区整合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重构过程。首先应转变政府及社区基层组织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观念,变防范式的行政管理者为柔性的合作者和服务者,以服务促管理,化被动为主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形成依托社区的流动人口居住地管理模式。对于中韩居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当地政府、社区基层组织、派出所等应主动同当地韩国官方或民间团体合作,在韩国人口密集社区广泛征求双方代表的意见,加快基于共识的行为规范和协调机制的建立,以期形成可供遵守的社区章程,促进社区内良性氛围的形成。另外,主动了解不同国籍社区成员的需求,积极探索对外籍人口提供公共服

务的社会化途径,鼓励政府和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相互合作,整合社区资源为外籍流动人口提供亟需的服务和保障,使他们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又是社区服务的参与者,同时也可将部分涉外服务产业集中化并纳入到合理监管之下,减少安全隐患和监督死角。

2 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作用,建立新型社区自治框架

在社区整合中,面对不同来源和文化背景的成员,应发挥居委会作为社区基层组织的核心作用,调动社区居民、志愿者以及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通过各种社区文化生活增进不同国籍住户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他们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对社区建设的共同参与和共同生活环境下的社会化交往,使不同社会属性的成员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相互谦让和认同的社区人际关系^[5]。同时,在韩国人口密集的可建立由各类成员代表共同参与的自治组织构架,搭建日常议事和解决分歧的平台,培育和创建示范性和谐社区。

3 规范社区物业管理,整顿租赁市场

严惩物业公司肆意出租的牟利行为,整顿社区内混乱的租赁中介市场,对于部分社区内商住错杂、秩序混乱的情况,工商、城管、公安、卫生等部门可协同力量进行综合整治,必要时政府可介入以激励手段推动开发商通过市场行为招募成熟规范的物业公司,引入先进的物业管理理念,并成立集中的租赁部对现状租赁市场进行整合。尤其在韩国租户数量较大的小区,有效集中的租赁管理有利于减少两国居民的摩擦,如通过对韩国租户的事前咨询服务间接调整不同国籍住户的居住分布,在社区整体混居的环境下,建立局部同质的小格局。

五 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北京的外籍人口聚居现象越来越显性化和集中化,以望京为代表,区内的韩国人已经初步形成了有相对稳定的集聚核心和模糊边界的聚落群体。韩国侨民与本地居民在物理界面上的高度混居、生态层面上的相互封闭、文化立面上的碰撞冲突构成了两国住户相互影响的主要内容。未来随着住房市场的放开和分化,随着来京外籍侨民的人数扩大和居留时间加长,将产生更多类型的外籍人口聚居区甚至是移民社区,衍生出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新课题。在全民共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

本文从社区整合层面对现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如何应对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不同机构、部门的齐抓共管，需要不断探索新观念和新机制。这方面的研究，“韩国村”提供了一个具有先行试验价值的样本，与其相关的故事值得继续深入关注。

致谢：衷心感谢周一星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Abstract】 The Korean people in Beijing have formed several concentrated areas as the migrating population becomes larger. One of these “Korean villages” in Wangji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ased on the first-hand data gained in the field-surve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ose issues about the Korean inhabited area such as its trait, status quo, impact on the original communities and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of fresh management for harmon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he inhabited areas of migrating population; Korean Village; community integration; Wangjing

注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住宿的，须于住宿人抵达后 24 小时内，由留宿机构、留宿人或者本人持所需证件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

参考文献

[1] 吴晓,吴明伟. 物质性手段:作为我国流动人口聚居区一种整合思路的探析. 城市规划汇刊, 2002 (2): 17 - 20

[2] T. R. Balakrishnan, Gyimah Stephen. Spatial residential patterns of selected ethnic groups: significa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2003 (1) : 113 - 134

[3] 周敏著,鲍震斌译. 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 商务印书馆, 1995: 220 - 222

[4] 俞德鹏. 现行城市外来人口管理方式的弊端. 城市问题, 2001 (1): 43 - 47

[5] 蔡小慎,王天崇. 社区治理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前沿, 2005 (1): 179 - 182

(责任编辑:张银太)

(上接第 46 页)

[4] 杨宏烈. 发展广州工业名企旅游的思考. 经济地理, 2006 (2): 43 - 45

[5] 王建国. 关于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中国 (广州) 城市景观设计展览会, 2004

[6] 张松. 东方塞纳河左岸——苏州河沿岸的艺术仓库.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7] 江哲炜,包志毅. 浅谈工业废弃地改造的生态恢复与遗迹保留. 华中建筑, 2006 (12): 183 - 186

[8] 杨宏烈,胡文中. 广州火车南站工业文化遗址保护规划. 城市问题, 2006 (8): 38 - 43

(责任编辑:张银太)